

# 知識人與國家的苦難關係

## ——評《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簡論》

● 袁洪權



謝泳：《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簡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990年代末，謝泳所著《教授當年》、《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逝去的年代》等著作，集中體現出他的現代知識份子研究思

路和史料搜集的執著精神。之後，《雜書過眼錄》、《儲安平與〈觀察〉》、《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相繼出版，體現了他一貫的學術追求。最近，閱讀《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簡論》（以下簡稱《困境》，引用只註頁碼），使筆者對謝泳目前的關注及這部著作產生了想要說的話。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伴隨着現代革命與社會現代化浪潮，在歷史變遷中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文化等的研究，最終還是必然回歸到對人的研究。這裏「人」包含的範圍極其廣泛，人事、著作、生平等等都應納入。正如陳子善所說：他「研讀中國現代文學史，歷來注重歷史的細節，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遊細節，作品的創作、發表和流傳的細節」，他「對法國年鑒學派的治學路向是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歷史的細節往往是原生態的、鮮活的，可以引發許許多多進一步的研究」①。

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文化等的研究，最終還是必然回歸到對人的研究。「人」包含的範圍極其廣泛，人事、著作、生平等等都應納入。謝泳的《困境》，正彰顯出對「人」的細節所作的微觀考察。而他關注的「人」，側重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謝泳最大的心願就是對現代知識份子的曲折命運進行梳理，並描述現代知識份子複雜的心路歷程。他總是帶着「同情」的心態，關注被遺忘的知識份子、被忽視的知識份子事件，或者是學院體制內多數學者不太在意的對象。

謝泳的《困境》，正彰顯出對「人」的細節所作的微觀考察。而他關注的「人」，側重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 一 深刻的歷史反省意識

敬文東曾說：「審視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和他們的心路歷程，不是為了向歷史撒嬌，更不是為了向歷史索賠，甚至不是為了簡單地證明誰對誰錯，而是為了保證今天和明天的我們活得更理智、更聰明、更幸福、更踏實。」<sup>②</sup>謝泳關注現代知識份子命運，挖掘知識份子命運細節，絕不是嘩眾取寵、招搖過市，而是建立在他深刻的歷史反省上。

《困境》一書，僅收錄謝泳最近十年的學術關注：1950至70年代新中國知識份子命運和知識份子事件（〈1949年前相對論傳播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一文除外）。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立的過程中，現代知識份子與新政權的關係出現微妙的變化，甚至曾一度緊張<sup>③</sup>。顯然，謝泳考察的是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現代知識份子。在他看來，延安知識份子與新政權並不存在緊張關係；他們以勝利者心態迎接新中國誕生，成為新政權合法的主人。但接受歐美教育、有留學經驗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卻不同，他們堅守自由主義價值，面對新中國成立，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與新政權在精神信仰上的緊張關係。特別是1951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使現代知識份子的這種內心緊張，被推到一歷史高度。

其實，長時間閱讀謝泳的文字，筆者發現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對現代知識份子的曲折命運進行有效梳理，並描述現代知識份子複雜的心路歷程。但他絕對不像當前中規中矩的學院派學者，要「中規中矩」地寫作像樣的學術論文。作為關注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者，謝泳時刻警惕他的研究被體制化。他總是帶着「同情」的心態，對研究對象進行關注。所以，在挖掘現代知識份子細節的過程中，他關注的恰恰是被遺忘的知識份子、被忽視的知識份子事件，或者是學院體制內多數學者不太在意的對象。例如，在一篇隨感文章〈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紀念王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中，關於王瑤，可供選擇的研究點很多，研究者一般「都會提到魯迅對他的影響」（頁1），但謝泳關心的卻是王瑤的學術底蘊、學術建構的真正來源。他從王瑤的學術文字隙縫裏發現，「1949年前王瑤重要學術論文中，引述最多的一個學者就是陳寅恪。王瑤關於中古文學思想研究的所有論文中，在同時代學者中，只提到過魯迅、劉師培、陳寅恪等極少數學者，而提到最多並直接正面引述觀點的，恰是陳寅恪。」（頁3）

在〈從一本國文教科書看中國現代文學教材模式〉一文中，謝泳選擇《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作為研究對象。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解放區建構「大學叢書」之一部，由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輯，前有葉聖陶序言，但真正參與此書編輯的，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國文系的同仁們。從《大

學國文(現代文之部)》的目錄中，謝泳揭示出教材背後反映的新中國大學「文學教學」的價值傾向：

一、它對作家和作品的選擇帶有明顯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沒有作品入選。……

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為先導，此點對於後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影響很大。……

三、對於新文學作家的認可，基本以毛澤東的喜好為尺度。……

四、以延安文化為唯一的取向。……(頁62-63)

他結合新中國成立後新文學教學問題作深入分析，並對李何林、王瑤起草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做了有效闡釋。此外，他認為王瑤在具體寫作《中國新文學史稿》的過程中，特別是上冊，還沒受到明顯的政治影響，秉承着他的學術傳統，所以上冊的價值明顯大於下冊④。

在〈「文藝學」如何成為新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以1951年《文藝報》一場討論為例〉一文中，謝泳通過對《文藝報》在1951年展開的一場討論，對學術轉化為意識形態的過程進行了剖析。在文藝整風運動中，文藝學教學首當其衝。1951年，《文藝報》以專欄形式，開始對文藝學教學進行有效規訓。在一篇題為〈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題〉的「編輯部的話」中，《文藝報》就文藝教學提出了看法：「現在有些高等學校，在文藝教育上，存在着相當嚴重的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的

傾向；也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教學觀點。」⑤原先在校園裏作為教材的文藝學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文藝報》批評，比如林煥平著《文學論教程》被批判的原因很簡單——該書「打起馬列主義招牌，販賣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反動言論，毒害群眾」⑥、「用資產階級唯心觀點來冒充馬列主義的觀點」⑦、「存在着帝國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文藝思想，使青年讀者受到了毒害」⑧。

教師隊伍的重新形塑，亦是批判的應有之義。《文藝報》的「編輯部的話」很快指出教師隊伍中存在的問題：「第一種情況是某些教師還十分缺乏思想上的自覺，不肯放下包袱，不願正視自己教學中的嚴重偏向」，甚至「企圖抗拒群眾的批評」，「第二種情況是自尋安慰，不敢和不願觸及自己的缺點」⑨。在黃藥眠、姚奠中、劉思虹的檢討文字⑩帶領下，文藝學教師隊伍受到「清理」。

在高等學校文藝學教學偏向的批判運動中，呂熒成為批判焦點，其問題由學生反映出來。這場關於文藝學教學偏向的討論，本身指向的是課程重新設置和高校教師的思想改造，但謝泳的思考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深入挖掘，透露出歷史的發展前兆，即日後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在1951至1952年文藝學教學批判之中預演了一次(頁72)。呂熒在運動中不僅「喪失」教授尊嚴，而且直接影響到「課程設置權力的消失」(頁87)。文藝學教學轉向的背後，還存在着如此複雜的人事關係和意識形態的轉型與建構。

關於文藝學教學偏向的討論，本身指向的是課程重新設置和高校教師的思想改造，但謝泳的思考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深入挖掘，透露出歷史的發展前兆，即日後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在1951至1952年文藝學教學批判之中預演了一次。

## 二 保有清醒的「史料意識」

在史料挖掘中特別注意細節歷史，透過細節歷史微觀地考察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這是謝泳的獨特之處。考察歷史的細節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面對同一史料，考察細微的人會閱讀到深刻的內容；而擅長宏篇大論的人往往不會注意細節。謝泳認為<sup>①</sup>：

我們現在研究歷史人物，掌握基本史料容易，但掌握歷史細節就比較難，而歷史細節常常最能說明歷史人物的氣質，在解釋歷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遺忘的細節，反而最能說明問題。

歷史細節的重要性，在此可見一斑。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到底是甚麼樣？謝泳微觀地考察了院士和學部委員選舉的變遷，對這一問題作了詳細分析。顯然，「政權轉換對知識精英的影響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頁33）。1948年院士的選舉，是「以學術為基本原則的選舉，沒有意識形態色彩」（頁36），這從兩個方面可得到確證：一、屬於國民政府官僚主管系統的人並沒有完全當選，如中國現代著名法學家王世杰，雖然當過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但在提名後並沒有當選為院士；二、對國民政府進行意識形態攻擊的人，如馬寅初、郭沫若赫然在名單上（頁36）。謝泳由此得出結論：「對一個時代學術制度的評價，要看它對於學者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說，一個時代

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對寬容，要以它的體制化行為來評價。」（頁37）但1955年學部委員選舉的標準卻發生變化，從學術水平到政治情況兩方面都納入考量，「學部委員必須是學術水平較高，在本門學科中較有聲望，政治上無現行反革命嫌疑的人」。在這種原則指導下，中國科學院列出了「不應列入的三條標準」和「應列入的四條標準」（頁40）。

給歷史人物作結論，看似輕鬆而簡單，但這些簡單的結論往往經不起歷史檢驗，更不可能在歷史長河中流傳下去。1950年代胡適批判運動，可謂聲勢浩大，體制力量亦參與其中，但體制力量的背後卻是政治權力的「運作」。《陸定一傳》中有句話，說1954年批判胡適，「郭沫若是感興趣的，原來他們的學術觀點就有分歧」<sup>②</sup>。為了深入批判胡適，徹底清除胡適在知識份子中的影響，1954年中國科學院院部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召開擴大會議，中國作協成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工作委員會」，委員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九人組成，下設秘書處，由劉大年、陳白塵、劉桂五、陳翔鶴、田鐘洛五人組成（頁231），陳白塵任主任（頁238）。

對待歷史人物，如果不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即使形成經典化敘述，但隨着時代變遷，經典敘述卻會成為歷史的反諷。當筆者在圖書館翻閱厚厚的八卷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時，不能不驚嘆當時學術界為批判胡適思想而對其思想的「分類」與「分層」曾作如此細緻的考訂。特別是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

在史料挖掘中特別注意細節歷史，透過細節歷史微觀地考察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這是謝泳的獨特之處。謝泳認為，在解釋歷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遺忘的細節，反而最能說明問題。

合會(中國文聯)的分工上,陣容如此壯觀:艾思奇(哲學思想批判)、侯外廬(政治思想批判)、范文瀾(歷史觀點批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批判)、黃藥眠(文學思想批判)、何其芳(《中國文學史》批判)、尹達(考據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張天翼(《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批判)、聶紺弩(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頁232)。這些召集人都是當時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著名的知識份子。他們在特定時代裏,往往被認為是最具有「精英意識」的知識份子,代表着知識文明的程度。但他們卻在批判運動的時代裏,充當着政治批判的「工具」。

馮友蘭和胡適的關係,非同一般。1949年國民政府搶救北京高校教授運動中,馮友蘭是搶救的對象,胡適親自過問過馮友蘭的情況。何其芳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他求學時代的北大校長正是胡適。從胡適對學生的關注來看,何其芳在延安及其在建國以後的情況,他不可能不了解。但胡適忽略的是,正是這些朋友、學生,徹底鏟除了他的思想在新中國的影響。歷史看似很簡單,特別是理解結論時,顯得相當簡略。但當我們重新梳理其過程時,歷史背後的複雜與沉重、複雜的人事關係讓人對建國初期知識份子的使命產生懷疑。他們往往把參加政治批判運動看作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王若水的回憶很值得「把玩」,因為參加這樣的政治批判運動,王若水內心相當高興,他覺得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頁233)。所以謝泳認為,對待新中國知識份子

研究,一定要恰當分析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態,萬不可斷章取義下判斷。

### 三 獨到的思想史眼光

研究新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期刊和報紙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在《困境》一書中,謝泳主要關注了《學習》、《紅樓》、《朝霞》、《文藝報》和《文匯報》。

針對《學習》的關注點,謝泳從思想史角度選擇1951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進行論述。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在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形塑」中,《學習》有着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文獻價值。該刊編輯部以胡繩、于光遠、王惠德等為代表,撰稿者是清一色的延安知識份子,他們的學養背景具有一致性。但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高潮時,該刊有四篇文章對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理論建構產生誤解:第1期許立群的〈只有馬克思

歷史看似很簡單,特別是理解結論時,顯得相當簡略。但當我們重新梳理其過程時,複雜的人事關係讓人對建國初期知識份子的使命產生懷疑。他們往往把參加政治批判運動看作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學習》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

《朝霞》是文革期間重要的文學期刊，但它在文學史敘述中卻「缺席」。因《朝霞》與文革文學的關係，對它的評價往往帶有「否定性」。謝泳指出《朝霞》完全是以文藝形式配合和圖解當時的政治，不是陰謀的產物。這對於還原《朝霞》的本來面目，意義非同小可。

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強調對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根本否定資產階級思想；第2期吳江的〈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把資產階級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欺騙手段」；第3期艾思奇的〈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本否認資產階級在革命歷史進程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幾篇文章的「主要意思」，就是根本鏟除資產階級在新中國的「生存」（頁128）。

《學習》的政治背景，決定了它代表着中共黨內的某種思想傾向。民主黨派人士及資產階級閱讀到這些文字，產生了很大驚恐：「他們問發表這幾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頁131）新中國成立的「合法性」，本身建立在《共同綱領》上，但《共同綱領》中明確地寫着「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份，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的代表」<sup>⑩</sup>。這說明新中國的階級構成中，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學習》發表這些文章，卻根本否認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它受到來自黨內高層的批評是

必然的，因為這涉及到中共在具體執政過程中的策略。謝泳挖掘了《學習》雜誌寫作檢討書的深層原因，在思想史的清理中完成了對這一事件的論說。這正是他獨到的思想史眼光。

《紅樓》創刊於1957年，學生和教師是主要撰稿人。由於《紅樓》創刊停刊均處於多事之秋的1957年，其文獻價值不容低估，「是研究中國『反右』運動史的重要史料」（頁147）。作為綜合性文藝雜誌，它與北京大學的內在思想史關係是值得梳理的。特別是那批學生後來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力量，顯然與他們大學時代的學術培訓有很大關係。謝泳認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變遷，對這個群體的關注，有助於深刻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總體發展水平」（頁151）。他着意之點，仍舊是思想史梳理。

此外，他還把《紅樓》和《新潮》作縱向比較，從作者群體、精神氣質到發刊詞，都有所梳理，並得出如下結論：《新潮》作者生活在開放時代，「在學術上具有創造性，在思想上具有先鋒性」，「許多參加過直接的政治活動，但沒有人為政治活動付出終身代價」；《紅樓》作者生活在封閉時代，「他們的獨立人格和創造精神已無法實現，扭曲的人生決定了扭曲的學術」，「凡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都付出了終身代價」（頁164）。

《朝霞》是文革期間重要的文學期刊，但它在文學史敘述中卻「缺席」。因《朝霞》與文革文學的關係，對它的評價往往帶有「否定性」。但回到文學史發生學意義上，「中國

1976年以後的文學源頭，其實是從這本文學雜誌開始的」(頁178)。筆者曾關注過並翻閱過《朝霞》，感興趣的還是它的版式設計以及封面畫面，這些細節處透露出一個時代的文學審美傾向。謝泳在閱讀文獻的基礎上，透露出重要信息：「《朝霞》完全是以文藝形式配合和圖解當時的政治，但雜誌本身並不是陰謀集團，也不是陰謀的產物」(頁182)。這對於還原《朝霞》的本來面目，意義非同小可。

眾所周知，由於學術界的浮躁心態，論文、專著的機械化生產，已經使學術本身的合法性遭受到質疑；論文、專著可以用數字來衡量，已經使學術研究本身貶值。始作俑者不是別人，不是學術體制，而是來自學術界的浮躁心態；二手資料的使用、垃圾文章的出現，使淨土一塊的學術界撕破了那塊「遮羞布」。以二手資料寫出的論文、專著，在謝泳的文字面前，其價值、意義的高下顯而易見。

儘管報紙在新中國很快實現「轉向」，但它透露的信息量仍是最大的。要了解新中國文學史、思想史歷程，關注報紙是必然環節。我們知道，要梳理新中國思想史，必須閱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新民報》、《大公報》。所以，讀謝泳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以1952年《文匯報》「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為例〉一文時，筆者倍感親切。

《文匯報》在建國初期是私營報紙，1951至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後

逐漸轉變其性質。它的辦報宗旨是為知識份子提供信息。相對而言，閱讀群體的文化程度比較高。但有一段時間，《文匯報》亦向中學生傾斜。謝泳從「文學制度的變化」入手，以1952年6月該報紙「文化廣場」新專欄中設置的「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欄目，看出很多事件的實質，「在純粹讀者參與的討論中，更能看出一個時代文學創作、文學教育、文學欣賞和文學評論的轉型是如何發生的」(頁96)。另一方面，作為1950年代校園普遍文化接受中兩部重要小說，《風蕭蕭》、《飄》(*Gone with the Wind*)因描寫了愛情穿插其間的故事，對中學生和大學生有着深刻吸引力。但當時看來，「這兩部小說都是黃色作品，因為它們寫了愛情」(頁104)，對青少年思想意識形塑會有腐蝕作用。所以，該欄目利用思想改造運動，結合兩部小說的批判來清理青少年的思想，可謂一石二鳥。

但這一欄目的設置，有深層的文化機制蘊藏其中。至少在筆者看來，《文匯報》推出這種專欄，與學習《中國青年》推薦青年閱讀書目有很大的「借鑒」關係。「組織」運作下的文學閱讀，應該是這次專欄設置的實質。或許，「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實現轉型，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閱讀方式形成，即「組織」運作下的文學閱讀。1955年10月，俄國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被共青團中央規定為青年團員必讀書，正是「組織」運作下文學閱讀的結果。

《困境》一書給筆者的總體感覺是謝泳強烈的「考據癖」。對於關注的事件，他不放過任何一項與此相關的資料，這是一種學術執著態度，卻並沒有讓他完全陷入繁瑣的考據中，相反，他講求故事性、文字生動，顯示出史學功底和特有的文風。

學術界需要這種「發現史料」的論著。隨着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愈來愈多的人逐漸喪失了史料搜集和整理能力。這對具有考據學傳統的中國學術界來說，無疑是學術傳統的「斷裂」。

做學術研究，按照中國傳統學術理路來分，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講求「義理」，一是講求「考據」。但在中國傳統學術思路上，考據學自清代以來一直有着重要影響。閱讀《困境》一書，給筆者的總體感覺是謝泳強烈的「考據癖」。對於關注的事件，他不放過任何一項與此相關的資料，這是一種學術執著態度。但這種「考據癖」，並沒有讓他完全陷入繁瑣的考據中，使文字顯得乾癟。相反，他關注每一事件，都講求故事性、文字生動，顯示出史學功底和特有的文風。

謝泳說到他「偏重史料搜集和判斷」，「對史料本身的興趣遠超過對史料的分析」（頁288），他認為這是他的缺點。顯然這是謙虛之言，與當前那些大而空的論著相比，學術界更需要這種「發現史料」的論著。隨着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愈來愈多的人逐漸喪失了史料搜集和整理能力。這對具有考據學傳統的中國學術界來說，無疑是學術傳統的「斷裂」。據筆者的閱讀經驗，以及當前研究生的培養中，資料搜集和整理的培訓已被冷待，儘管研究生人數和規模在擴大，但論文和專著的質量卻每況愈下。看到《困境》這樣厚實而有故事性的著作出現，無疑給浮躁的學術界一服清涼劑，值得大家細細「品味」。

### 註釋

- ① 陳子善：《邊緣識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2。
- ② 敬文東：〈長廊與背影書系·總序〉，載耿傳明：《周作人的

最後22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2。

③ 謝泳從1990年代就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新中國政權的關係進行梳理，他的關注點集中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內心裏的緊張心態。

④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後，很快受到批判。《文藝報》為此召開座談會，邀請北京的新文學研究者、新文學作家、文教部門官員進行座談，試圖規訓新文學史寫作，從座談會記錄中可看出。

⑤ 〈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題〉，《文藝報》，1951年第5卷第2期，頁3。

⑥ 聞山：〈荒謬絕倫的「文學論教程」〉，《文藝報》，1952年第5號，頁23。

⑦ 姚文元：〈注意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文學理論〉，《文藝報》，1952年第5號，頁25。

⑧ 林煥平：〈我決心批判我的反動思想〉，《文藝報》，1952年第9號，頁39。

⑨ 〈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題〉，《文藝報》，1951年第5卷第5期，頁22。

⑩ 黃藥眠：〈關於文藝學教學的初步檢討〉、姚奠中：〈我對文藝學教學的檢查〉、劉思虹：〈也談談我的文藝學教學〉，均見於《文藝報》，1952年第4號，頁23-27。

⑪ 謝泳：《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177。

⑫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394。

⑬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

袁洪權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7級博士生，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西昌學院中文系教師。